

近日,青岛诗人闫殿才先生的新著《山海人间》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他继《半尘》之后的第二本诗集。诗如其人,闫殿才的作品继续保持了含蓄、内敛、不事张扬的基调,同时也在更宏阔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有了深入的挖掘和发现。坦率地讲,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诗歌式样,闫殿才的现实生活状态同样也是我所欣赏的。

“虽然进入诗歌江湖很容易,但做一名诗人还是有门槛的。”这是我与闫殿才的共识。我们认为,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,必要的文化储备和知识积累是不可或缺的,能够流畅自如地把写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置换成诗意的文字,是一项必备的“技术”前提。那些病句连篇,“的地得”搞不准的人,仅靠简单的分行和断句是无法担得起“诗人”名分的。为了便于与“诗歌江湖”进行区别,我们将诗人创作的场域称之为“诗歌界”,这也是我们当下所关注的重点。纵然如此,在诗歌界仍然也是众声喧哗,各怀心思。大家在不同领域自觉和不自觉的探讨中呈现出多极化指向,诗歌界的嬗变是在“大雪无痕”的时空中发生的。

诗歌的去功利化路径。回顾新中国的诗歌史,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大繁荣的时代,诗歌所能给予诗人的功利性回报是丰厚的,有的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世俗利益。一些50后诗人,是那次诗歌大潮的“空前绝后”的利益既得者。及至进入21世纪,诗歌的功利性功能渐次消退,当时我曾预言“诗行里不再有米粒和爱情”。事实也是如此,后来加入诗歌写作的60后、70后诗人,再也体会不到前辈们当年的幸运了。现在还在坚持诗歌写作的,一定是出于真正的爱好,而不可另作他想。

诗歌走进技艺的“胡同”。近几年,诗人的写作越来越重视技术重塑。一方面,境外大量诗歌翻译出版,多种思潮和技艺得以传布。另一方面,诗人寻求“标新立异”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基因。两者邂逅,对于技艺的痴迷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流,对于技艺的探讨似乎也成了时尚的雅谈。如同画家们聚在一起愿意谈色彩、虚实、远近和光影一般,诗人们凑成一堆则更喜欢讲意象、解构、主义和张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声嘶力竭的痛,奋不顾身的爱,没有底线的恨,远离红尘的“丧”等各种“极致”的手法占据了诗坛。对于技艺的过度追求和放纵,稀释了诗歌的思想表达,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,诗歌便会走进死胡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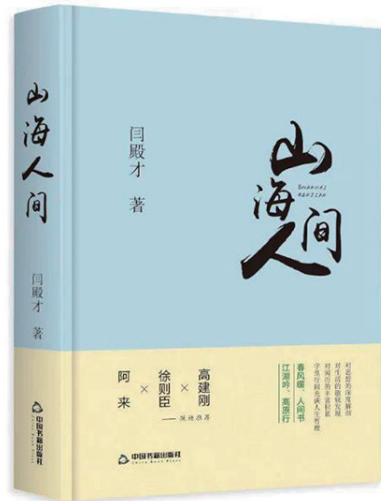
诗歌需要高举思想的旗帜。阅读闫殿才的《山海人间》,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思想的力量。很显然,闫殿才有意识地摒弃了滥情的文字表达,简练、干净的诗行直抵思想高度和哲学境界。“有时候,写自己,写着写着,便写成了他人/一些委于腹腔的疼,会减轻许多//有时候,写他人,又不自觉地,写成了自己/一些感动,便先于笔尖,落在纸上”“不敢保证自己走过的路,说远的话,做过的事儿/是真的。也不能否认是假的//我写我时,可能,写的是你/我说对时,可能心里,早已否定了一千次//真真假假,都是人生”这种与世界和解,也与自己和解的姿态,其实就是与整个人生的一次彻底和解。自然而然地,他告诉读者“关于这本书,相信,比不相信,要好一些”。

无论是为文,还是为人,“大知闲闲,小知间间”几成定律。闫殿才的诗歌在轻盈的文字中透着沉重如枷的生活印痕,在貌似不经意间散发着深思熟虑的哲学追问。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加持,这样的诗句难以生成。诗歌有深度,有高度,有广度,源于诗人的敏锐发现和深刻剖析。毫无疑问,闫殿才在文化的多个维度上已经拓展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

闫殿才是入行较早的诗歌爱好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靠经商谋粥养家。其间,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他疏离了文字,也远离诗歌。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葱岁月,对文学义无反顾地“断舍离”,让他幸运地躲过了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的尴尬。近几年,当他翩然回归文学的时候,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,带着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成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由过去的仰望星空,到当下的平视人间。此时此刻,山海人间,皆为如诗如画的风景。这种风景,既是自然的,也是人文的,更是灵魂深处的。无论是“江湖吟”,还是“人间书”都有了抚慰人心的温度。“高原行”罢“春风暖”,如此阳光般的写作风格,可以轻而易举地与读者实现共鸣和共情。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,这种直入红尘,却又高标逸韵的诗歌写作状态堪为同道典范,足为后来者式。

平庸的人玩不了诗歌,也当不成诗人。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偏见,但至今不曾改变。经商赚了些散碎银两后,闫殿才不必为“五斗米折腰”了,这让他的诗歌写作纯粹而又干净。如同他的钓鱼爱好,同样没有计较斤两的功利追求,他只是在享受一种有趣的生活罢了。其实,这种诗意的生活才是诗人应该恪守在胸的不二正途。

作者简介:崔均鸣,诗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## 诗歌与诗意生活

——由诗集《山海人间》引发的思考

崔均鸣

## 峥嵘岁月里一曲动人赞歌

——红色题材电影《战歌行》观后

李凤玲

电影《战歌行》是一部以抗战时期胶东“孩子剧团”为原型的红色题材影片。浩瀚的大海,宁静的渔村,残酷的战争,纯真的孩子,影片将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,艺术地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,吟唱了一曲动人赞歌。全程106分钟的观影,令人心潮澎湃,深深动容。

《战歌行》故事的发生地是胶东,山情海韵自然是影片中展现最多的场景。剧组为了真实再现20世纪30年代胶东小渔村的景观,特意在影片拍摄地海阳搭建了一座座海草房。因此,无论是艺术再现,还是历史本真,《战歌行》创作团队做到了二者兼具、完美统一。

静谧的海边小村,只是《战歌行》故事的自然环境,抗日的烽火,才是历史的大背景。彼时,日寇的铁蹄早已踏破了东三省,七七事变也已爆发。为了唤醒民众,贺团长(范修竹饰)带领“孩子剧团”走进渔村,用唱歌和演戏的方式宣传抗日,但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。关于抗日,有以隅村老八爷(郭九龙饰)为代表的消极与侥幸,也有像掖县村民一样的积极与觉醒。无论哪一方,都在影片中得到了真实的再现。懦弱保守的隅村村民,幻想能够偏安一隅,但当面对鬼子的疯狂扫荡,面对亲人的死去和断壁残垣,顽固的老八爷终于觉醒;而在积极抗战的掖县,村民们将剧团的孩子领进家中,保护他们的安全。他们与鬼子展开肉搏,不惧牺牲,英勇壮烈。正是剧团孩子们的演出,让一颗颗原本就不屈服的心,变得更加勇敢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响起,这是“孩子剧团”的歌声与呐喊,这是民众的激愤与怒吼,也是电影《战歌行》里最雄壮的背景音。

《战歌行》不仅故事背景辽阔深厚,故事情节同样真实感人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“老烟锅”(李维忠饰)的琴声和“小眼镜”(夏子轩饰)的讲述,这一老一少的两处细节,刻画得尤其细腻。“老烟锅”在“孩子剧团”里年纪最大,拉得一手好二胡,每次演出都是由他给孩子们伴奏。在一次躲避敌人扫荡的大撤退中,剧团与鬼子遭遇。“老烟锅”为了保护孩子们,拉起胡琴将鬼子引开。敌人循声步步紧逼,“老烟锅”躲进一处被炮火炸毁的院落。当鬼子一脚踢开大门,发现“老烟锅”闭目坐在院子里,从容自若地拉着胡琴。鬼子现身,“老烟锅”怒目圆睁,赤手空拳和端着刺刀的敌人展开搏斗,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,壮烈牺牲。甚至他杀死鬼子的武器,也是一根琴弦。他与他的琴,都为抗日而死。深沉低回的琴音久久回荡,冲击着每一个观者的心扉。

尽管有流血,尽管有牺牲,但“孩子剧团”依旧勇敢地演出。他们歌唱,他们呐喊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和参与着抗战。在掖县演出时,鬼子突然进村,将“小眼镜”绑在舞台上,命令他说出谁是八路军。日寇的烧杀抢掠曾经让他恐惧,“孩子剧团”的火热生活让他变得自信和勇敢,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,一向文弱的“小眼镜”目光坚定、一字一句地说:“明天我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?我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,骑着崭新的自行车。学校里开满了花儿,孩子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。我们的衣服是暖和干净的,早上吃鸡蛋,中午是打卤面,饭后再吃个水果,那是最好不过……”他眼神里充满向往,他所说的“明天”,不就是我们的今天吗?我们眼前的幸福,正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。不忘过去的苦难,方能珍惜今天的幸福。

《战歌行》无论是环境的渲染,还是情节的起伏,最终都是为了托起一个个丰满的人物。影片塑造的是群像,是整个“孩子剧团”。无论“老烟锅”还是“小眼镜”,无论贺团长还是严指导,无论李一铭还是白百灵,无论胖张还是小画家,都塑造得非常立体,相当成功。其中着墨最多的李一铭,因为想到前线去打鬼子,初到剧团时非常抗拒。进入剧团之后,李一铭感受到了歌唱的力量,音乐的力量,艺术的力量。一个个嘹亮的音符就像点点萤火,只要积聚起来,照样可以点亮黑夜。美丽的贺团长,英俊的严指导,可爱的小画家,纯洁的白百灵,幽默的胖张,文静的“小眼镜”,他们都是“孩子剧团”里光荣的一员,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,他们为了宣传抗日动情地歌唱。为他们伴奏的“老烟锅”牺牲后,孩子们只能清唱,嘹亮悦耳的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,黄河在咆哮”响彻舞台,响彻胶东,响彻全中国。

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。影片结尾,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孩子们坐着渔船,驶向了新的战斗岗位。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泛黄的合影,这是1940年6月1日胶东“孩子剧团”反“扫荡”胜利后的合影,是当年“孩子剧团”成员的真实影像。照片中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仿佛穿越了时空,站在了我们面前。他们一定看见了今天我们美好的今天,看见了今天六月的阳光下所有孩子的笑脸。

作者简介:李凤玲,教师,特约评论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  
zaobaofukan@126.com  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  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岛」  
扫码关注